

创 桥 学 派 概 念 史 译 丛

主编 李宏图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A·布雷特 詹姆斯·塔利 H·H·布利克利◎主编

胡传胜 邵怡◎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A·布雷特 詹姆斯·塔利 H·H·布利克利◎著
胡传胜 邵怡◎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英)塔利等著;胡传胜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17-7340-6

I. ①重… II. ①塔…②胡… III. ①政治思想史—欧洲—文集 IV. ①D0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728 号

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

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著 者 A·布雷特,J·塔利,H·H·-布利克利
译 者 胡传胜 邵 怡
策划编辑 周 洁
审读编辑 包广将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40-6/D·148
定 价 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Rethinking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1st Edition/97805211615037 by Annabel Brett, James Tully, Holly Hamilton – Bleakle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 - 2008 - 332 号

中文版前言

李宏图

2005年,《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出版之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剑桥学派”的关注,这说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为更加系统和全面地引介“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过一段时期的研读、思考与准备后,我决定选择将“概念史”作为主题,组织同行选译与此有关的重要学术著作。因为“概念史”不仅是“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的重点,而且国内学术界对此也较少关注。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帮助下,现在“剑桥学派概念史”这套译丛终于得已面世。

斯金纳在他思想史研究的三卷本论文集《政治的视界》中这样说道,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承认概念变化的事实,而且还要将它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概念”在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时间性和多重性日益受到思想史家们的重视,由此逐渐开辟了概念史研究,并成为具有独特理论和方法支撑的专门领域。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研究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接受、转移和扩散来揭示概念是如何成为社

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讨论影响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义和这一含义的变化,以及新的概念如何取代旧的概念。实际上,重点是要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概念的定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种占据主导性定义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概念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被再定义和再概念化的。同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概念的转换,甚至消失,最终会被新的概念所取代。

目前,经过学者们数十年的努力,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系统和成熟,并形成了两大学术流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要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研究概念史。斯金纳自己也一直说,我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变迁与修辞的关系。他通过对一系列概念历史的研究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1978年出版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他研究了“国家”这一概念,着重考察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也就是说,这一定义的“国家”概念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要以“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同样,沿着这一思路,在1997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他又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考察。在研究中,他并没有简单地重新恢复这些概念的含义和意义,而是研究这些有争议的概念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是如何逐渐取得了其主导性地位。值得重视的是,斯金纳不仅展开了对有关“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而且对支撑概念合法性基础的原因也进行了研究,探讨“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维度与语言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因为思想家们所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其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语言表达本身,从本质上来说,他们都是在用这样的修辞方式来为某种概念存在的合法性作辩护,或者解构某种合法性。

另外一种概念史研究的路径是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的变化集合在一起进行考察,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历史学家考斯莱克。由于受到德国社会史学术传统的影响,其概念史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社会转型和概念变迁之间的关系。由于一个社会改变了其基本价值或者实践方式的时候,同时也就改变它的规范性词语。因此,要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来理解概念的变化,在长时段中把握概念的命运,即概念的兴

起和衰亡。

对于概念史的两研究路径,斯金纳评论道: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最终也会消失。我承认,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

从概念史研究的空间来说,目前不再仅仅局限在这两大流派的诞生地英国和德国,法国、荷兰、芬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对概念史的研究也十分踊跃,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已进入到了概念史研究领域,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

目前,国内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介绍。与开展概念史研究的其他国家,即使与我们相邻的日本和韩国相比较,我们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正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翻译这一套丛书,借以推进国内概念史研究的发展。

在这套丛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作为这套丛书的主持者,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译者,他们都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为了做好此次翻译工作,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推掉了其他的写作任务,一心扑在了翻译工作上。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诸多朋友,特别是责任编辑周洁女士,通过他们的努力,从版权的洽谈到图书的编辑,各个环节都做到了高效和顺利,从而保证了这套丛书的如期出版。

在这套“概念史”翻译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学界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洋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寿福教授、张巍博士和夏洞奇博士等,他们帮助处理了诸多语言上的问题,在此表示谢意。

2008年,当这套丛书还在翻译中的时候,恰逢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我也应一家杂志之约对国内30年来的西方思想史研究作了回顾。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这样写道: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在这一

变化中各个国家都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中国学者才刚刚开始接受和引进他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仍然还没有参与到国际学术界这一变化的学术发展进程中,更不要说已经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特且有原创性的研究取向和理论方法,或者说研究范式。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自暴自弃,相反,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更需要加倍努力,迎头赶上。

也许本套译丛能够体现我们的这一主旨,并印证着我们一直耕耘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那种执著和努力。

2009 年 11 月

序 言

J·塔利

A·布雷特

本书源于2003年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举行的同名研讨会——《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以下简称《基础》)出版25周年研讨会。我们觉得首先应该向使研讨会能顺利举行的所有人表示谢意。感谢霍利·汉密尔顿-布利克利,提出研讨会的最初想法,并为它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艾沙·波利策和杰奎琳·罗斯的帮助既有效率又开心,值得效仿。不过我们最大的谢意当然应该给予我们的发言者,他们的那些很优秀的文章与评论,造就了这样一个值得纪念且具刺激性的思想时刻。我们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因为篇幅的原因没能把他们的所有稿件都收录进来。大卫·科尔科拉夫,蒂姆·霍克斯特拉,凯瑞·波罗宁,琼·波·鲁比斯对讨论进行了记录,我们想表达特殊的谢意。我们也想表达对约翰·萨尔蒙的特殊感谢,他对这个项目的慷慨帮助以及对欧洲思想史的卓越贡献令人难忘。

为什么25年以后,昆廷·斯金纳的《基础》仍能成为我们想推进的那种再思的合适主题,存在着若干个理由。在那本书的序言中,斯金纳所明言的一个目的,只是对17世纪到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写一个“更反映新观点的概述”,他所叙述的新研究与新方法是从1936年比埃尔·梅斯纳的《16世纪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起,他把这本书视为这种努力的开始。他所展开的那些事件、人物、范畴,带有先前的一个分析传统的明确标记,该传统可追溯到他的剑桥前辈约翰·尼维尔·弗格斯在20世纪初的著作。不过他在这两卷书中的志向,却并不限于将这些新研究整合到一个已有的分析框架中。正如“序言”所交待的,他想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思考材料,以展示他自己的

两个主要的新观念：一是这种转变的故事，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之产生的故事；第二个是，书写这个故事，首先，并不意味着书写西方正典中的“伟大文本”，而意味着书写构成那个时代政治话语的规范性的词汇与意识形态。斯金纳极富启发性地假定，只有在这些词汇中，这些伟大文本才能发现其意图与意义；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才能找到连续、变化与转变的位置。

就此而言，斯金纳的书，前承着一个直到当时的经典的书写传统，后启着一个政治思想史应该如何研究的新洞见。他的这种双重面向的《基础》一书是非凡的和知名的。斯金纳有效地重新配置了中古后期和近代早期的政治思想研究领域，后来的一代学者受他的计划与方法的启发，在这个领域内继续推进。当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扩展他所测定的范围，对其实质性的分析以及这些分析的方法论前设进行质疑、细化和扩展。当然，斯金纳本人某种程度上也在做同样的事。抱着原创的精神，这次研讨会和文集目的既是回顾这些发展，估量它们的重要性，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展望这些新的进展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将会把我们置于何处。

《基础》本身并不是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但它却是一本自觉地为某种方法论提供例证的书。因此作为导言，本书的前两章将致力于这个主题。马克·戈尔迪将《基础》置于 1970 年代剑桥的思想背景中，而霍利·汉密尔顿-布利克利从斯金纳与科林伍德、维特根斯坦与奥斯丁的方法论对话的角度对这本书进行评论。接下来四章围绕《基础》第一卷，主要涉及文艺复兴的市民人文主义与自由这两个斯金纳一直投入主要精力的领域。约翰·波考克回到了该书的写作年代，来描述它原初的对话意图，并批判性地估价斯金纳的这本关于这些主题的著作所选择的方向。马科·格那一开始考察了《基础》对意大利前人文主义修辞文化的重建，然后思考这种重建对他后来论马基雅维里和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论“新罗马”自由观的意义。沃伦·布特切爾通过不同的触角检视这个时代，在文艺复兴印刷文化内部质疑了重新发现作者意图的可能性，以及因此，历史主体性时刻的可能性，而这种主体性正是斯金纳的方法论最终要开启的。最后卡西·柯蒂斯以托马斯·莫尔、斯金纳关于文艺复兴政治思想史中非常突出的人物为例，重新考察了他的共和主义的本质，质疑了与斯金纳著作相关的

“新罗马”术语的解释力。

接下来三章讨论《基础》第二卷的主要论题,斯金纳首次有力地对反宗教改革以及加尔文主义抵抗理论中经院主义政治思想的再解释。哈罗·霍普尔质疑了斯金纳一些范畴的历史适当性,以及在某种意义上,整个“经院主义政治思想”这个概念的适当性。安纳贝尔·布雷特思考了国家概念兴起故事中的经院主义者的地位,并提问我们关于二者的图像在何种程度上能把他们对非欧洲民族的反思包括在内。马丁·范·吉尔德伦通过对加尔文主义和路德教话语的差异的再考察,再情境化了斯金纳有关抵抗理论的著作,并将分析扩展至17世纪的新教抵抗理论直至洛克,正如斯金纳自己在《基础》中所展示的那样。

第8—11章沿着同样的方向,讨论霍布斯和《基础》最终围绕的现代国家概念。理查德·塔克和金希·霍可斯特拉就霍布斯是不是民主派理论家的问题展开辩论。这个问题,正如他们所显示的,在一个非常深的层次上涉及思考他对国家性质与功能的理解。相比之下,大卫·阿米蒂奇将目光移至疆土国家之外,分析霍布斯在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历史中的地位。最后,斯金纳本人回顾了《基础》和本书的章节,回应了它们中的某些最为强烈的观点,澄清了他自己的某些主张,为这些争论中的、重要的主题提供了新的和富有独特启发性的思考。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又欠下乐于在此表达的新的情义。我们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查德·弗舍尔持续的鼓励与支持。我们还要感谢康纳尔·唐纳森、迈克·辛普森和我们的技术编辑希拉里·斯坎内尔,他们令人钦佩地、耐心地处理了编辑细节。我们也要感谢加拿大皮埃尔·特鲁多基金会和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支持。不过最后我们必须对昆廷·斯金纳为这个项目所做的一切,也对他对于我们以及他的许多学生与同事的持续的精神与人格上的鼓舞,致以最热烈的感谢与敬意。

目 录

序言 / 1

第一部分 导论

第1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语境 马克·戈尔迪 / 3

第2章 语言哲学与《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霍利·汉密尔顿-布利克利 / 22

第二部分 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第3章 基础与时刻 约翰·波考克 / 39

第4章 斯金纳、前人文主义修辞文化与马基雅维里 马科·格那 / 53

第5章 “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托马斯·莫尔与昆廷·斯金纳
卡西·柯蒂斯 / 77

第6章 经院哲学政治思想与近代国家概念 安纳贝尔·布雷特 / 99

第7章 “匹夫而已”:欧洲近代早期的反抗理论 马丁·范·吉尔德伦 / 120

第8章 霍布斯与民主 理查德·塔克 / 147

第9章 房间里的狮子:霍布斯与民主 金希·霍可斯特拉 / 172

第10章 霍布斯与近代国际思想的基础 大卫·阿米蒂奇 / 203

第11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审视:回顾与重估 昆廷·斯金纳 / 222

参考书目 / 251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1章 《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的语境^{*}

马克·戈尔迪

—

昆廷·斯金纳的早期著作既致力于方法论问题,也致力于实质性的历史解释。的确,他通过其方法论而不是其第一个研究领域,即英国革命的政治思想^①的文章,赢得了广泛的读者。他被引用最多的文章《意义与历史观念的理解》发表于1969年,在强烈批评他的同事们的实践方面是令人吃惊地走向极端的。^②因此,当《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于1978年出现的时候,它的评论者们便既联系其作者在方法论上的训喻来评价此著,又判断本书在它所讨论的历史主题中的贡献。在所有事情中,《基础》是个英雄般的冒险,而且在这些评论者中,不乏幸灾乐祸之人,他们声称它无法通过作者

* 感谢 Holly Hamilton – Bleakley, Clare Jackson, Jacqueline Rose, Sylvana Tomaseli 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意见。《基础》的简短评论只引用作者和杂志标题。

① 斯金纳的许多文章现在都以修订的形式收入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他早期讨论17世纪的主要文章是“History and Ideology i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Historical Journal* 8 (1965), pp. 151–178, repr. in Skinner, *Visions*, III。

②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pp. 3–53. repr. in Skinner, *Visions*, I。

本人所倡导的方法论的检验。

在本文中,我通过记录对《基础》的早期反应来重访斯金纳思想史研究途径的某些方面。我的目标有三。第一,我探讨 1960 年代历史学科中斯金纳认为存在于思想史研究方法中的某些障碍。第二,我讨论对《基础》的一个特殊批评,说它对于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凸现,公然持一种目的论解释。第三,自始至终,我强调斯金纳的著作受惠于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在这项讨论中,需要铭记于心的是,《基础》的主要语境是 1960 年代不列颠的历史实践,因为本书源自斯金纳 1965 年第一次在剑桥大学所开设的那些课程。

恰当地说,主导着斯金纳方法讨论的,是他得益于由 R·G·柯林伍德、J·L·奥斯特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清晰阐明的语言哲学,霍利·汉密尔顿-布利克利收录于本书下一章的文章将致力于讨论这个问题。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马克斯·韦伯对其有相当不同的启发之源,韦伯一直笼罩着《基础》,他的《经济与社会》也是他引证的第一本书,刚好前于对柯林伍德的赞扬。^① 1960 年代对韦伯兴趣的广泛复兴,有助于克服存在于思想史创新道路上的那些障碍。1970 年代早期,斯金纳对行动与解释理论的处理非常接近于韦伯的理论社会学传统的理解。^② 当他 1974 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成员时,这种兴趣就更浓厚了,因为在克利福特·格尔茨这样的社会理论家中,他遇到了一种敌视实证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韦伯的理解概念。这个概念对于社会行动中个体行动者自己的主观意义之理解,居于关键地位。

在 20 世纪中期的那 20 年中,一种强烈的实证主义或隐或现地出现于英国各式各样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特别是那些研究“高级”政治,以及那些的确想把“高级”政治作

① Quentin Skinner, *FMP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I, p. x.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eds.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2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斯金纳著作中的韦伯因素在 Kari Palonen,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中有清楚的分析。

② Skinner,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 and Quentin Skinner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4th series (Oxford: Blackwell, 1972), repr. in, *Visions*, I; Quentin Skinner, “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Political Theory* 2 (1974), pp. 277–303; repr. in Skinner, *Visions*, I.

为他们学科的本质部分的那些人。斯金纳从思想史内部对他的同行的批判是知名的——《观念史中的意义与理解》主要针对的就是他们,但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高级”政治史家(他们完全贬低思想史)的批评,他专门著文分析英国历史学界两个重量级人物,列维斯·纳米尔和埃尔顿的假定。他对纳米尔的批判出现于他为其剑桥同事J·H·普拉姆的纪念文集中。^① 普拉姆在其《英格兰政治稳定的增长,1675—1735》(1967年)中宣称自己已从纳米尔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因而为恢复英国第一个正常政治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开辟了道路。斯金纳对埃尔顿,剑桥大学这个资深教授的摧毁性批判,直到1997年才最终出现。他指出埃尔顿的“事实崇拜”,对政治史的狭隘崇拜,将思想史从“真实的生活中消除”的立场,以及他在什么样的历史是“坚硬”与“真实”问题上所特有的令人吃惊的片面。^②

纳米尔和埃尔顿是这样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指导性的原则就是拒斥历史主体自己对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的解释。纳米尔把意识形态,即社会与政治生活的规范性观念的表达视为病态,是对于事情的真实状态的一种系统的曲解。对于他来说,历史家是意识形态的揭露者,他要暴露政治行动之赤裸裸的物质基础。思想史家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历史行动者的表达抱着天真的严肃态度。王公贵族和知识分子所做的辩论只是强词夺理的自我辩护,是权力运作和行动者“真实”动机与利益的副产品。用纳米尔值得注意的术语来说,意识形态是纯粹的“梦呓”。^③ 用更加专业的行话,它们是“副现象”。后一个词也被马克思主义者相似地使用着,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高级”政治的保守主义实践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共享着一个基本假定,而人们以往争论和发表的,并不是历史之至关重要的材料。相应地,用埃尔顿的话,在历史

① Quentin Skinner,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of Opposition: the Case of Bolingbroke versus Walpole”, in Neil McKendrick (e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English Political Thought and Society* (London: Europa, 1974), pp. 93–128. repr. in Skinner, *Visions*, III.

② Quentin Skinner, “The Practices of History and the Cult of the Fact”, *Visions*, I, pp. 8–26, 首发于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7 (1997), pp. 301–316.

③ L. B. Namier, *England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30), p. 95. 他对方法的一般反思,见 *Personality and Power* (London: Macmillan, 1955)。